

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有銎战斧的功能及相关问题研究[※]

——从公元前 1 千纪草原武士墓葬的情境分析出发

张文珊¹ 邵会秋²

(1.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省东方人类起源与文明探源重点实验室

2.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情境考古学的视角,对有銎战斧的出土环境、墓葬特点、墓主性别和器物组合等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有銎战斧的功能,进而尝试揭示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体现。

【关键词】有銎战斧 欧亚草原 情境

DOI:10.16327/j.cnki.cn15-1361/k.2025.02.007

情境(Context)是源自西方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本义为“彼此缀合”或“将零散的东西串联起来”^①。伊恩·霍德认为情境是相关环境的总和,是所有有助于界定客体意义的显著相关性和关联^②。这一概念在我国考古学界已被普遍使用,常译作“情境”或“背景”,包括考古材料自身的出土背景与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与“透物见人”有关的诸多关联性^③。对于器物研究而言,则是一种以“器物为主导”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器物存在的环境、器物和其所处环境的互动^④。墓葬材料通常保存完整,而且丧葬行为与社会结构及信仰有着直接关联,从墓葬情境中解读的信息对于探讨墓主人的社会身份和等级等社会组织状况常常会产生很有意义的结果^⑤。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从情境考古学的视角,分析欧亚草原东部地区^⑥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有銎战斧的出土情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有銎战斧的功能,尝试揭示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体现。

一、欧亚草原东部出土有銎战斧的墓葬情境分析

有銎战斧^⑦因其出色的机械性能和便于携带的特点,得以在欧亚草原这一区域范围广泛传播。它作为兵器的稳定组合,参与到埋葬习俗中,反映出使用人群背后所表达的身份特征、地位观念和意愿。

(一) 高等级墓葬情境分析

公元前 8~7 世纪,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普遍流行的有銎战斧——鹤嘴斧,集中出自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墓葬中,其中出土有銎战斧的高等级墓葬数量相对较少,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而且多随葬能够体现墓主身份地位的珍稀材质和高技艺的器物。其中萨彦-阿尔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最为集中,图瓦的阿尔然(Аржан)一号王冢^⑧和二号王冢^⑨,阿尔泰地区的埃列克-萨兹(Елеке Сазы)4 号金人冢^⑩、齐列克塔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元前 1 千纪欧亚草原东部的兵器系统与作战方式研究”(项目批准号:24CKG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生物考古视野下欧亚草原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项目批准号:23VLS007)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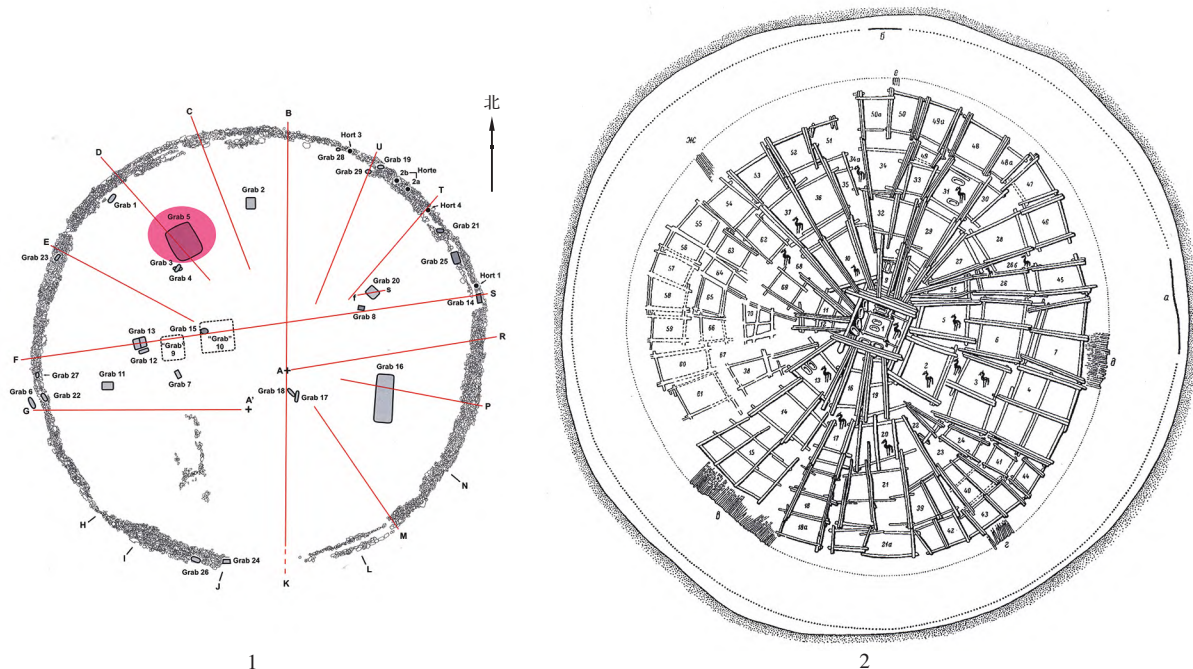
(Шиликты) 3 号墓地 M1^①、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东塔勒德墓地 II M3^②，均为公元前 8～7 世纪前后高等级墓葬的典型代表。以下介绍图瓦的阿尔然一号王冢和二号王冢。

阿尔然一号王冢整体呈圆柱形，直径 120、高 4 米，这个复杂的木结构是由 70 个呈放射状排列的小墓室构成，每个墓室都用圆木隔开，中央为 88 平方米的中心墓室，中心墓室的大型木椁中并列有 2 具东西向独木棺，分别葬有 1 名老年男性和 1 名成年女性，头向西北，均侧身屈肢，应当为国王和王后或者相当于这一级别的贵族。大型木椁外和其他小墓室还殉葬大量的马匹。据统计，阿尔然一号王冢中共计殉葬马匹 160 具，另有大量不完整的马骨，属于 300 匹马的个体（图一，2）。由于主墓室被盗掘，阿尔然一号王冢出土的器物主要是兵器和马具，其中兵器主要包括 1 件鹤嘴斧、3 件短剑和大量的铜镞，这些随葬品均出自于陪葬墓之中。

阿尔然二号王冢地表也有圆形坟丘，直径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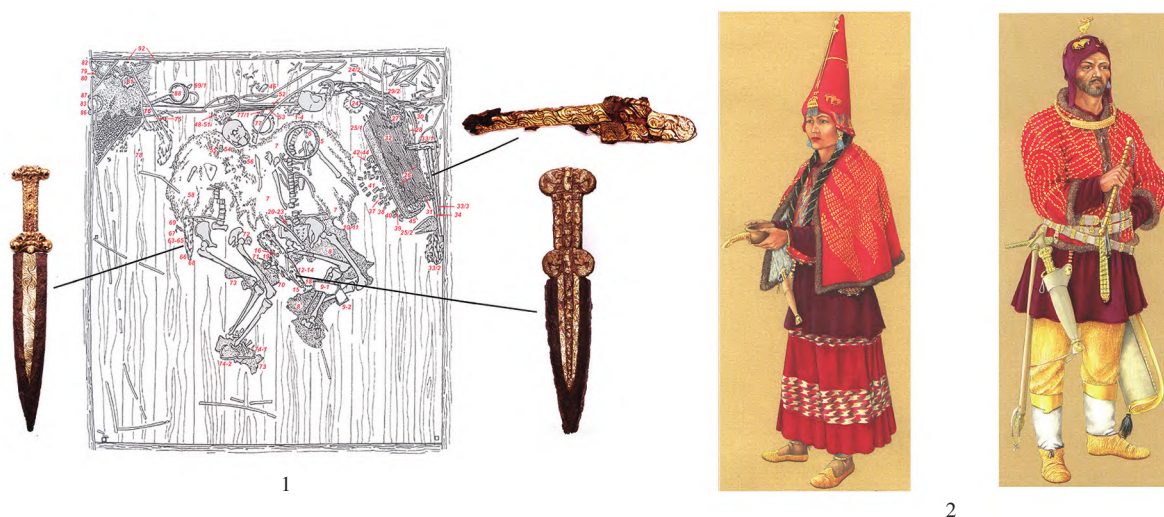
米，高 2 米，这座土丘保存得相当完好。在同一冢内有多处竖穴土坑墓室（图一，1）。其中西北部的 5 号墓是埋葬墓主人的墓葬。坑内是用桦树圆木搭建而成的椁室，椁室内葬有 1 男 1 女，男性在北，女性居南，均侧身屈肢，头向西北。发掘者根据出土器物，对他们的穿戴服饰进行了复原（图二，2）。阿尔然二号王冢出土了 9000 多件随葬品，其中有 5700 件金器。这是整个欧亚草原区域内迄今为止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据人骨鉴定，男性年龄为 40～45 岁，女性年龄为 30～35 岁，男女墓主人腰部各佩戴一把装饰繁缛动物纹的金柄铁剑，男性墓主人身旁还放置一件包金铁鹤嘴斧和弓袋（图二）。此外在坟冢边缘位置还发现一些陪葬墓，多为男性单人葬，侧身屈肢，也有一些双人葬的男性墓，陪葬墓中随葬品较少，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在 M20 和 M25 各出土青铜鹤嘴斧 1 件，形制与 M5 的铁鹤嘴斧一致，但没有包金装饰。

这两座高等级墓葬的规模都很宏大，年代在



图一 阿尔然一号王冢和二号王冢平面图

1. 阿尔然二号王冢 2. 阿尔然一号王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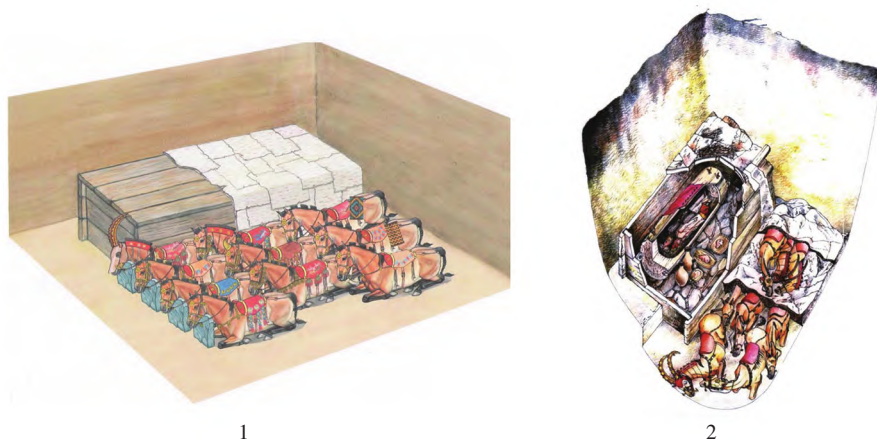
图二 阿尔然二号王冢 M5 墓葬平面图和墓主人装束复原图

(墓主人复原图采自 Konstantin V.Č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Anatoli Nagler,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urgan Arzan 2 in Tuva,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 图 225 和图 226)

公元前 8 ~ 7 世纪之间, 二号王冢年代晚于一号王冢。墓葬主墓室均为男女合葬, 附近都有陪葬墓和殉葬的整匹马, 陪葬坑里除了鹤嘴斧、短剑等兵器和马具外, 其他的随葬品很少见, 说明这些陪葬坑里有部分可能是墓主人的护卫。值得关注的是, 二号王冢的主墓室并没有和一号王冢一样位于土丘的正中间, 这很可能是一种防止被盗掘的措施。二号王冢主墓室的随葬品也表现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明显差异: 男性墓主人有成套的兵器, 包括鹤嘴斧、短剑和弓箭等, 表明男性生前也是善于征战的首领, 而女性墓主人虽然也随葬 1 件短剑, 但其他随葬品多为装饰品, 这件短剑也可能是一种防卫性质的兵器。

至公元前 5 ~ 3 世纪, 高等级墓葬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以

阿尔泰的别列里 (Berel) 墓地为例, 这个墓地中心有两座大型的库尔干 (10 号和 11 号库尔干), 代表了该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 每个库尔干下只有一座墓室, 男女合葬, 但没有陪葬坑, 而且木棺外分别整齐地排列着 10 匹马和 8 匹马, 每匹马上都有豪华的装饰, 一些马具上都有包金装饰 (图三)^⑥。类似的墓葬在新疆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也有发现, 喀拉苏墓地 M15 随葬上下两层 13 匹马, 出土了一些包金器物, 但和其他很多的高等级墓



图三 别列里墓地高等级墓葬复原图

1. 10 号库尔干 2. 11 号库尔干

(复原图分别采自 Зайнолла Самашев.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Таймас, Баспа Уйи. 2011, 报告 193 页和 23 页)

葬一样被盗掘，大量文物流失^⑨。虽然残留的出土材料无法反映墓葬的全貌，但也能看出与阿尔然一号王冢和二号王冢的区别，这个时期高等级墓葬没有陪葬坑，说明丧葬习俗发生了变化，随葬品种类变少，特别重视马匹的装饰，大量使用毛织品、木器、骨器和金器装饰马匹，极其奢华，反映了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现象，其他普通武士的墓中也普遍随葬整匹的马，只是马的数量没有高等级墓葬多。

虽然高等级墓葬中罕见的金属材质、器类或者工艺能够展现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曾经企及的最高水准，代表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和精神层面价值，但另一方面，贵族墓葬的特殊性可能导致某些表现形式是偶然性的产物，无法做出普遍性推论^⑩。因此，普通武士墓葬更能反映当时社会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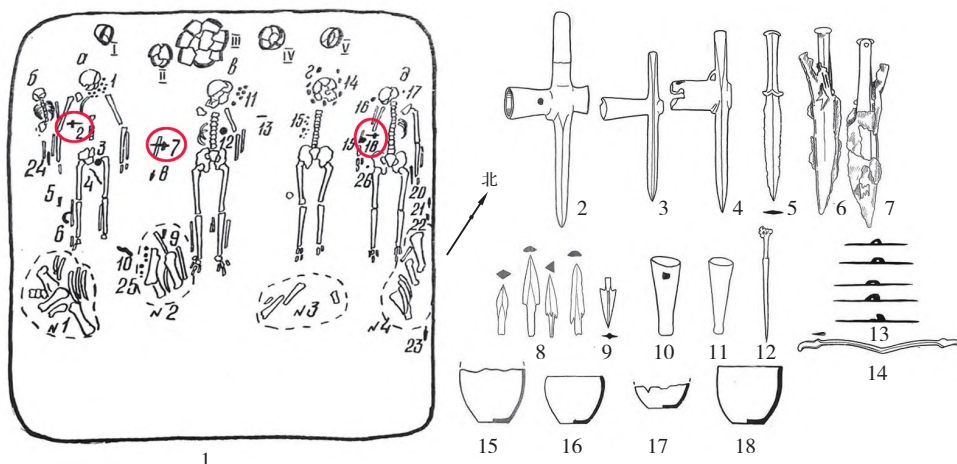
（二）普通武士墓葬情境分析

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大部分有銎战斧都出自普通武士墓葬，而普通墓葬随葬的兵器种类和组合与高等级墓葬基本一致，只是这些兵器都没有华丽的装饰。

米努辛斯克盆地北部的谢列布里亚科沃墓地（Серебряковско）8 号库尔干 M1 是一座平民墓葬，

埋葬 1 个儿童和 4 个成年人，其中有 3 名成年人配有鹤嘴斧和短剑兵器组合，推测为成年男性。兵器都位于腰部附近，表明是随身携带的，鹤嘴斧与镞配套使用，其他出土物包括骨镞、铜镞、铜锥、镜形饰、弓形器饰件和陶罐等^⑪（图四）。4 名成年人中有 3 人随葬鹤嘴斧，反映出墓葬中随葬鹤嘴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另外，鹤嘴斧、短剑和镞等兵器共出，可能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兵器组合。

另外一个典型的单位是米努辛斯克的比德扎（Биджа）墓地 1 号库尔干 M1，属于塔加尔文化波德戈尔诺沃时期^⑫。1 号库尔干 M1 墓主为 1 名成年男性、1 名成年女性和 1 名男性少年。成年男性头戴铜泡装饰，右手握着鹤嘴斧，左臂放置箭镞，双脚佩戴脚环。少年右手持鹤嘴斧，双脚佩戴脚环。女性墓主头戴铜泡装饰，佩戴耳环（图五）。这个墓葬可能反映了成年男性、女性和少年的家庭关系，墓地其他墓葬也都是成年男女合葬，虽然没有 DNA 的鉴定结果可供参考，但很有可能是夫妻合葬。墓葬的随葬品可以明显反映出男女之间的差异。女性墓主人只随葬少量装饰品（图五，3），而男性墓主人则随葬鹤嘴斧、镞和装饰品（图五，1），男性少年也随葬有鹤嘴斧和



图四 谢列布里亚科沃墓地 K8M1 墓葬平面图和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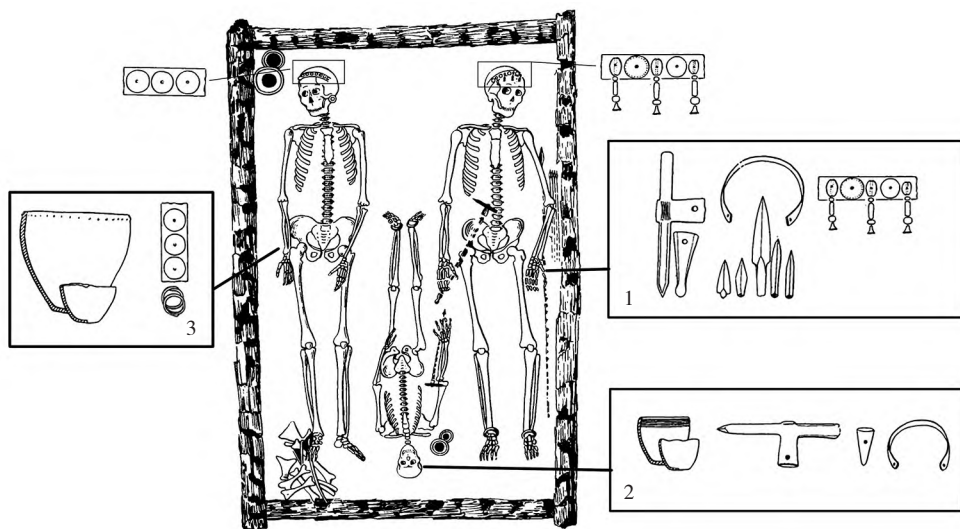
1. 墓葬平面图 2-4. 鹤嘴斧 5-7. 短剑 8. 骨镞 9. 铜镞 10、11. 铜镞 12. 铜锥 13. 铜镜形饰
14. 弓形器 15-18. 陶罐

少量的饰品（图五，2）。这表明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作战主要以男性为主导。另外，少年男性也随葬兵器，这位少年已经有十几岁，完全有能力承担作战职责，所以推测他可能是一名少年武士。这也说明该社会中男性从少年开始可能就要承担参与战争等社会责任。

哈卡斯共和国 ПМК 工业区 6 号墓地 M3，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武士合葬墓，这座墓埋葬的人骨属于 9 个个体，墓室中间有 3 个完整的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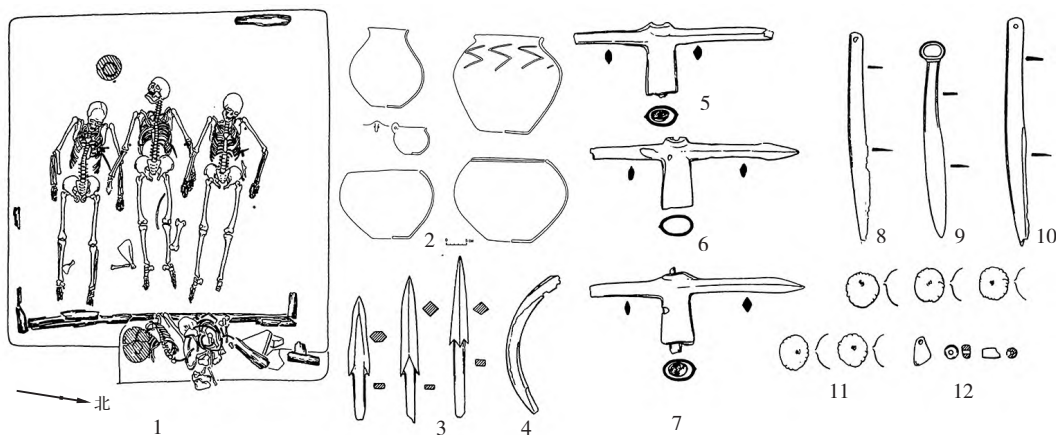
从左向右分别是 30～35 岁、50 岁和 35～45 岁的 3 名成年男子。另外在他们脚下还发现一些零碎的人骨，这些个体包括 1 个老年男性、2 个成年男性、2 个成年女性和 1 个七岁儿童。墓室中间三个完整的个体都随葬了鹤嘴斧、铜刀和骨镞（图六），他们应该都是当时的武士。

在单人葬中，随葬兵器的男性比例非常高。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随葬早期鹤嘴斧的墓葬，均为男性武士墓。在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



图五 米努辛斯克比德扎墓地 K1M1

1. 成年男性墓主人随葬品 2. 青少年随葬品 3. 成年女性随葬品



图六 ПМК 工业区 6 号墓地 M3 墓葬平面图和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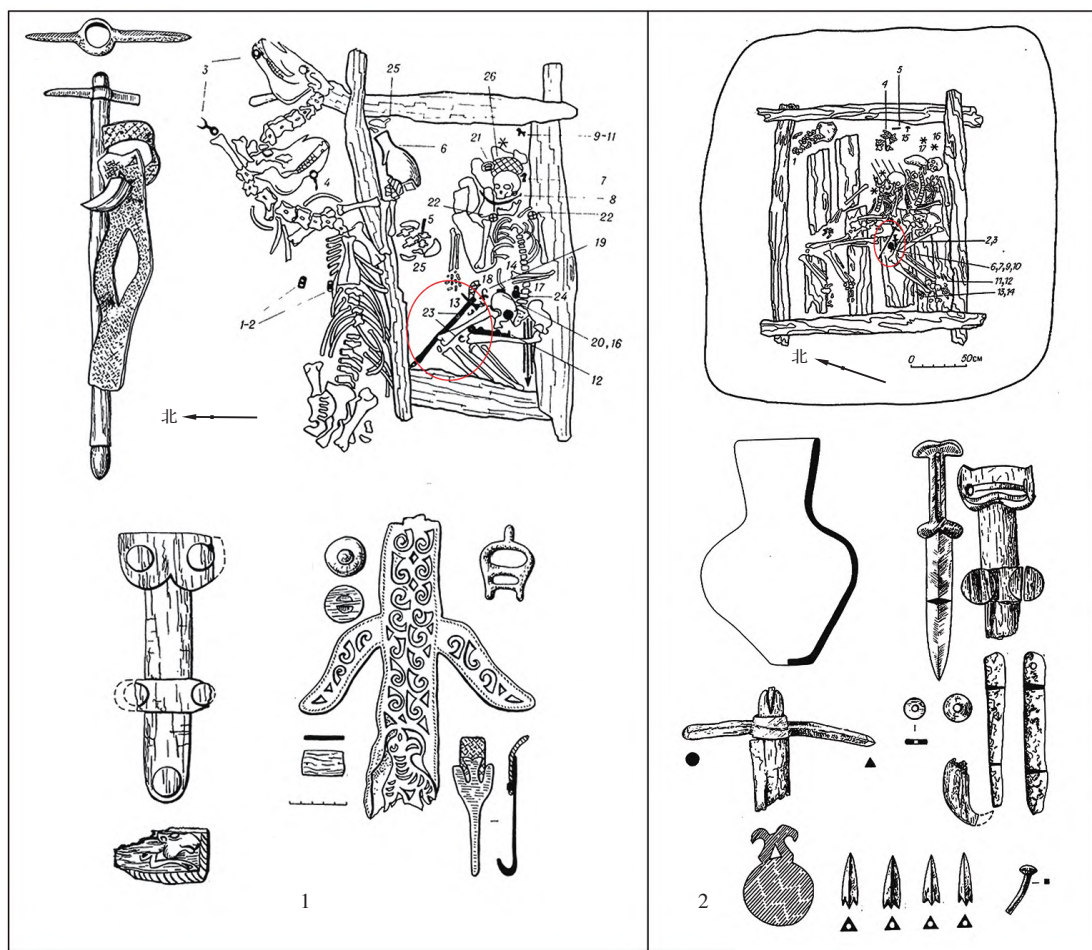
1. 墓葬平面图 2. 陶器 3. 骨镞 4. 骨弓弭 5-7. 鹤嘴斧 8-10. 铜刀 11. 铜泡 12. 石珠

文化中，所有出土兵器且单独埋葬的武士墓墓主人几乎均为男性，以阿尔泰共和国乌兰德雷克（Уландрык）Ⅳ号墓地3号库尔干和马尔达卢（Малталу）Ⅳ号墓地25号库尔干为例^⑧，两座墓葬都是男性单人葬，随葬品比较简单，腰部都放置一件鹤嘴斧，有短剑、木质剑鞘和镞等兵器，还有少量的装饰品，是巴泽雷克文化普通的武士阶层墓葬的代表（图七）。

同样以男性武士为主导的情况也见于其他地区，在图瓦萨格利-巴兹（Саглы-Бажи）Ⅱ号墓地9号库尔干^⑨，发现了6个个体，随葬的兵器包括鹤嘴斧1件、短剑1件、骨镞1件，这些兵器均属于Ⅱ号墓地个体，是1名55～60岁男性，很

可能是一名武士（图八，1）。中国北方地区的内蒙古毛庆沟墓地M38为单人葬，墓主为40～45岁男性，出土的随葬品包括铁短剑1件、铁鹤嘴斧1件、长方形铁饰牌1件、双鸟纹铁饰牌1件和陶罐1件，也应该是当时的一名武士（图八，2）。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实际上男性墓葬随葬兵器的现象在整个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非常普遍，在北京延庆地区玉皇庙文化墓葬中，随葬短剑等兵器的墓葬近百座，其中玉皇庙墓地中就有77例，但其中没有一例是女性墓葬^⑩，在南部的农业社会中更是如此。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工，男性在社会和战争中占据着主角，女性主要处于从属的地位。



图七 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举例

1. 乌兰德雷克Ⅳ号墓地3号库尔干 2. 马尔达卢Ⅳ号墓地25号库尔干

（三）女性墓葬的情境分析

虽然男性在社会和战争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并非所有女性墓葬都不随葬兵器。在西哈萨克斯坦的萨夫罗马泰文化中，随葬兵器的女性墓葬比例超过了 20%^⑩。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萨夫罗马泰部落的女人与男人是一样的着装，她们骑马、狩猎和参与战争^⑪。而且在西哈萨克斯坦还发现了一些武士石雕^⑫，腰上都悬挂着短剑等兵器，这些石雕表现的也都是女武士形象（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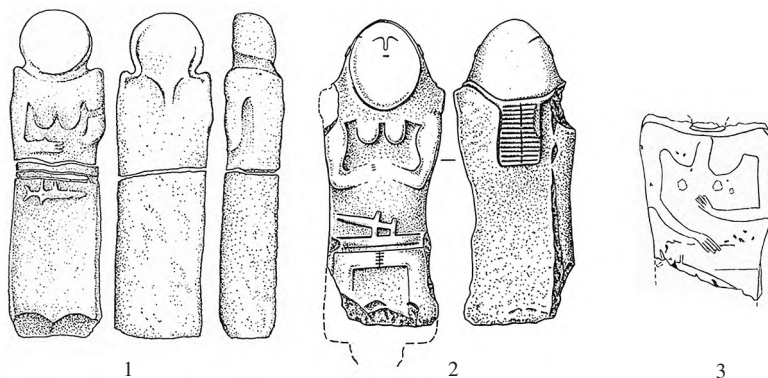
萨夫罗马泰是文献中就已经明确记载的拥有大量女武士的人群，草原其他地区的女性在社会分工中，仍然主要是从事日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不过也有一些特例。如北京昌平白浮墓地 M2^⑬，这座墓葬的墓主人是女性，而且随葬了大量的兵器和马具，因此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女性军事将领。另外，蒙古阿尔泰地区巴加-图尔根郭勒（Baga Türgen Gol）一号墓地 M8 的情况也比较特殊。这座墓葬是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库尔干。墓坑由石头砌成，长 2.5、宽 1.9 米，墓室的北面随葬着三匹马。墓室最南侧是 1 名成年男性，墓室中间是 1 名成年女性，他们之间有 1 名儿童。男

人的腰部发现了腰带，上有木质的腰带饰和带扣（图一〇，7）。值得注意的，每个人的腰部附近都随葬一件铜鹤嘴斧（图一〇，2）、一件铜短剑（图一〇，4）和木剑鞘（图一〇，3），鹤嘴斧和短剑都有明器化特征，随葬品中还发现箭袋和箭（图



图八 图瓦和中国北方地区男性武士墓葬举例

1. 萨格利-巴兹 II 号墓地 9 号库尔干 2. 内蒙古毛庆沟墓地 M38



图九 西哈萨克斯坦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女武士雕像

1、2. 克孜鲁伊克神庙（Святынище Кызылуйк） 3. 阿克克神庙（Святынище Акуйк）

一〇, 5), 所有这些物品似乎都是专门用来埋葬实物的复制品^⑤。这座墓葬的女性和儿童都随葬成套的兵器, 很可能表明成年男女均是武士, 而且从墓葬规模看, 男性墓主人可能是小部落的首领, 而儿童随葬兵器或许表现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期待, 而且作为部落首领, 他们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勇猛的武士, 甚至可以继承自己的地位。

以上这些例子都表明, 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是存在一些女性武士, 她们与其他女性的社会分工存在着差别, 而且死后埋葬时也要体现出这种差异。还有个别儿童能够随葬成年人的兵器, 一般在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才会出现儿童随葬兵器的情况, 这些儿童都是部落首领或贵族的孩子, 表明了在当时社会中财富和地位存在着传承现象。

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有銎战斧的功能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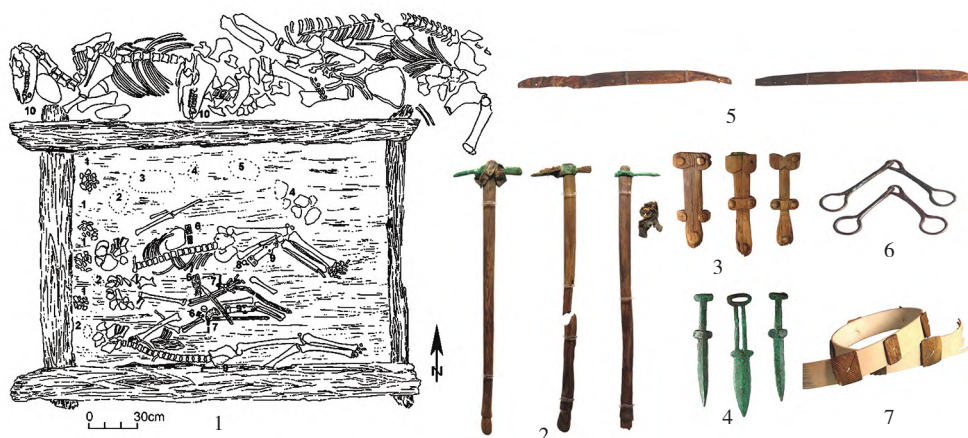
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有銎战斧, 从分类上看, 应该属于兵器类, 具体功能以作战为主, 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功能, 我们将从考古发现的情境分析, 对这些器物的功能进行讨论。

有銎战斧一般都出土于武士墓葬中, 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科班文化 (Koban) 塞尔热尼 - 尤尔

特 (Serjen-Yurt) 墓地中^⑥, 武士主要随葬兵器、马具和装饰品, 包括有銎战斧、短剑、矛、马衔、马镡、别针和手镯等 (图一一, 1-9), 复原图直观地展示了公元前 11 ~ 7 世纪科班文化武士的形象 (图一一, 10), 其中有銎战斧则是随葬品中非常重要的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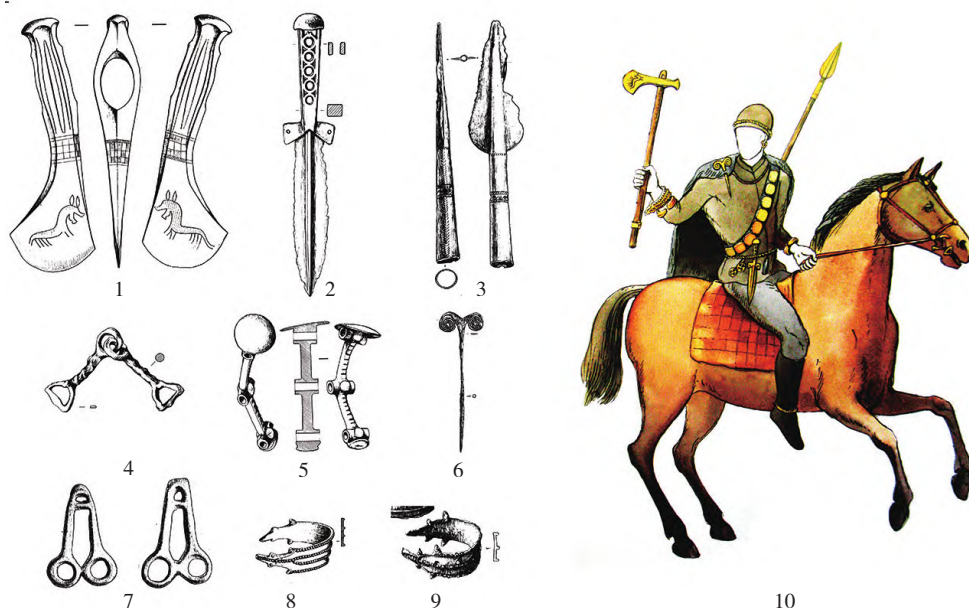
草原人群还将武士形象制成石雕像, 蒙古草原的鹿石是最典型的代表, 刻划的是草原武士的形象, 在相当于武士腰的位置雕刻腰带, 腰带上 (或相当于腰部的位置) 常刻划悬挂的各种兵器, 有銎战斧和短剑是鹿石上刻划的典型兵器组合 (图一二, 1)。在武士墓葬中, 这一点表现地更加明显, 在山西吉县上东村发现一座被破坏的武士墓葬^⑦, 墓主人身两侧分别随葬了 1 件有銎战斧和 1 件铃首剑 (图一二, 2), 反映了当时主要的兵器组合。

在公元前 1 千纪, 发现随葬鹤嘴斧的武士墓葬数量非常多, 尤其是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萨彦 - 阿尔泰地区, 可以说鹤嘴斧是当时草原地区最普及的战斗兵器。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中, 短剑一般放置在腰部, 鹤嘴斧则放置在身体一侧 (图一三, 1), 多数鹤嘴斧与铜镞搭配使用 (图一三, 2、3)。从墓葬随葬品看, 鹤嘴斧和短剑是当时武器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图一〇 巴加 - 图尔根郭勒一号墓地 M8 墓葬平面图和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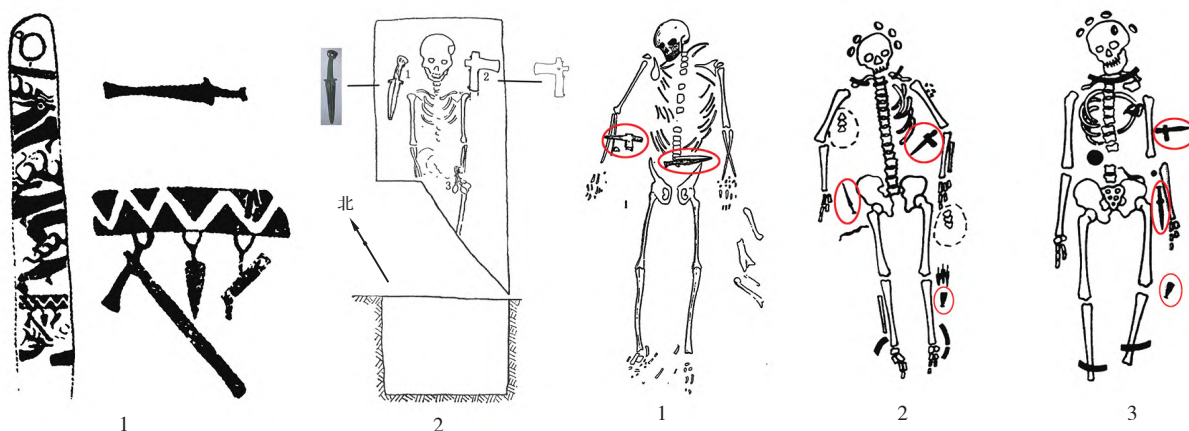
1. 墓葬平面图 2. 鹤嘴斧 3. 剑鞘 4. 短剑 5. 箭袋附件 6. 铁马衔 7. 腰带



图一一 北高加索科班文化塞尔热尼-尤尔特墓地墓葬出土器物及复原图

1. 有銎战斧 2. 短剑 3. 铜矛 4. 马衔 5. 马镫 6. 别针 7. 坠环 8、9. 手镯 10. M38 武士复原图

(复原图采自 В.И. Козенкова. У Истоков Горского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Памятники Ин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2002. 图 24)



图一二 有銎战斧的情境信息举例

1. 蒙古国后杭爱省伊赫塔米尔县鹿石^② 2. 山西吉县上东村武士墓

图一三 塔加尔文化发现短剑和鹤嘴斧墓葬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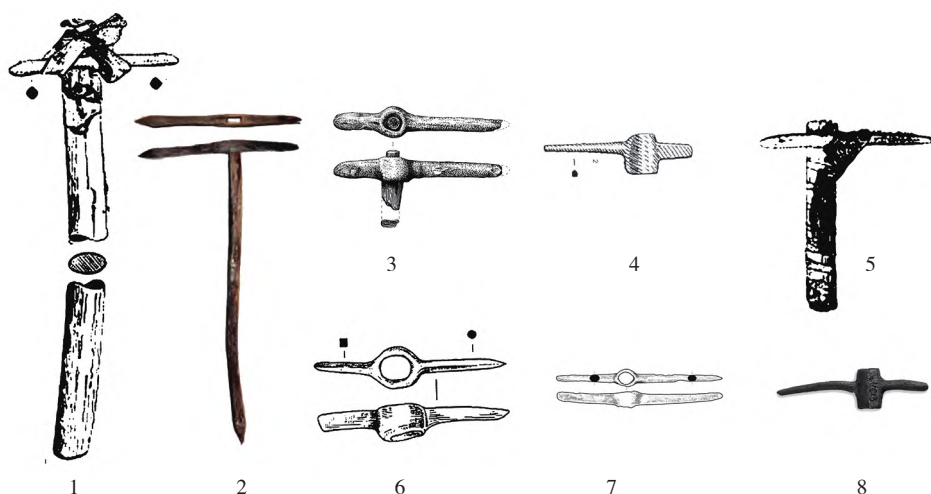
1. 乌戎朱尔 (Ujungul) 墓葬^② 2. 雅古尼亚 (Ягуния) 墓地 K12M1^③
3. 雅古尼亚墓地 K13M2^④

有学者提出部分鹤嘴斧可能是用来清理石块或寻找矿藏的工具,理由是一些鹤嘴斧的尺寸较小,在 10 厘米左右,不适合安装长柄,也不能作为兵器使用,应该是一种工具^③,我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境外发现的墓葬中出土的鹤嘴斧基本都是安装长柄,发现短柄的例子都是因为腐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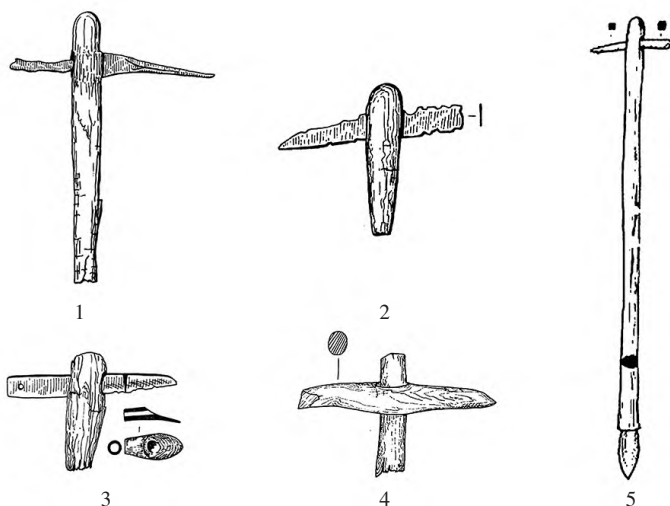
残断的;其次,鹤嘴斧基本都是出土于男性墓葬,出土位置多位于腰部,往往与短剑配套使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尺寸小的鹤嘴斧作为明器使用,这在境外草原地区发现的非常普遍(图一四)。这些鹤嘴斧尺寸在 6~10 厘米之间,都不具有使用功能,是专门随葬的明器。

这些用于陪葬的鹤嘴斧为缩小版、制作相



图一四 明器鹤嘴斧举例

1. 克孜尔-扎勒 (Кызыл-Джар) V号墓地 2号库尔干^⑤ 2. 亚罗曼 (Яломан) II号墓地^⑤ 3. 齐聂达 (Чинета) II号墓地 24号库尔干^⑤
4. 阿什贝尔 (Ашпыл) 墓地 26号库尔干 M2^⑤ 5. 克孜尔-扎勒 (Кызыл-Джар) V号墓地 3号库尔干^⑤ 6. 巴尔布加兹 (Барбургазы) I号墓地 13号库尔干^⑤ 7. 阿尔切达特 (Алчедат) I号库尔干^⑤ 8. 别寥若夫河口墓地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21号库尔干^⑤



图一五 阿尔泰地区墓葬出土的鹤嘴斧模型

1. 乌兰德雷克 III号墓地 K7^⑤ 2. 尤斯特德 (Юстыд) XII号墓地^⑤ K3
3. 乌兰德雷克 II号墓地 K6^⑤ 4. 巴尔布加兹 I号墓地 K23^⑤
5. 巴尔布加兹 I号墓地 K18^⑤

对粗糙的明器，但仍安装长柄。而且，在巴泽雷克文化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更加简陋的鹤嘴斧明器，这些明器有的是用金属片插入木柄中（图一五，1-3），有的甚至完全使用木头制作（图一五，4、5），这种情况的明器化特征更加明确。

同鹤嘴斧一样，与鹤嘴斧搭配使用的短剑也出现了明器化现象，在公元前5~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缩小尺寸的短剑（图一六）。有意思的是，部分短剑的木剑鞘是全尺寸的，但短剑却是缩小尺寸的（图一六，4、5），有研究者认为，下葬时使用全尺寸的剑鞘会让墓主人在来世继续使用标准的短剑^⑤。这种外观看起来像是正常标准的短剑，尺寸小，制作粗糙，实际是一种缩小版的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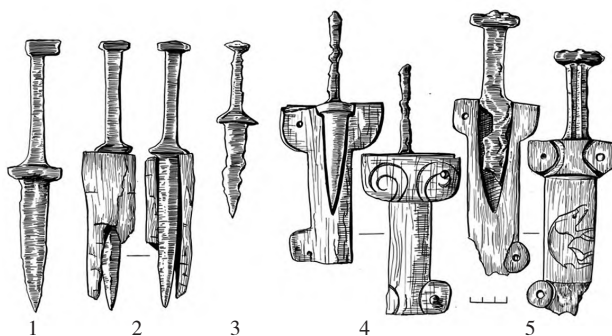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草原地区的鹤嘴斧基本都属于兵器，那些尺寸较小的鹤嘴斧很可能都是明器，而不是作为工具使用的。由于保存环境

较差，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鹤嘴斧没有保留下来木柄，但北方地区的鹤嘴斧都是受到境外影响而出现。因此，北方地区出土的尺寸较小的鹤嘴斧可能和境外草原地区一样，也可能是作为明器使用的。当然也不否认，一些有銎战斧可能会临时作

为工具使用，但并不能将其归入工具类，制作这些有銎战斧的初衷是用作兵器或者兵器的替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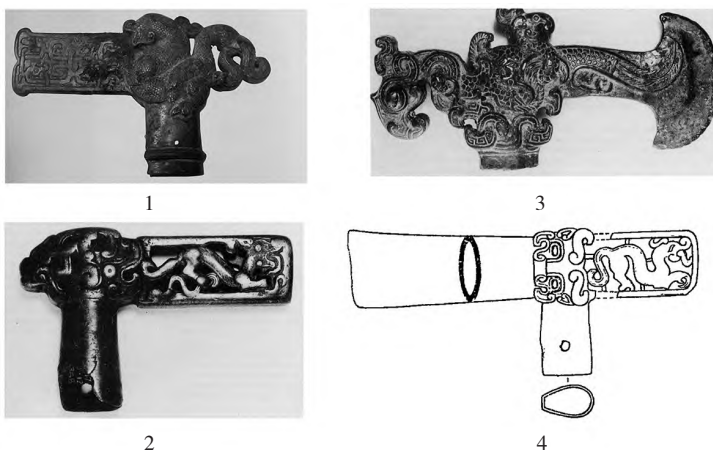
当然，除了实用的兵器和墓葬中的明器，一些有銎战斧还具有礼仪性功能。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 1 件鸟首纹战斧^④，銎部上端饰浮雕怪兽，以其爪捧持斧身，其后则做鸟形，鸟喙衔一蛇，斧身长方形，饰阴线蟠螭纹，通长 12.8 厘米（图一七，1），德国柏林东亚博物馆也藏有 1 件形制一致的战斧^⑤。这种战斧装饰繁冗，且没有杀伤力，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用器。大英博物馆也收藏了两件类似功能的有銎战斧^⑥（图一七，2、3），据传均出自中国。在侯马墓地也出土 1 件^⑦，装饰有镂空兽纹和饕餮纹，通长 16.2 厘米（图一七，4）。这类礼仪性的有銎战斧一般与中原文化相关，一方面其装饰风格不属于草原文化传统，与中原的艺术风格更为密切，另外一方面制作这类礼仪性有銎战斧对技术的要求更高，草原人群缺乏相应的铸造技术，而中原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使用这类兵器，只是把它们作为礼仪性用具使用。

同样作为礼仪性战斧也见于中亚西部和西亚的农业社会中，在中亚西部的马尔吉亚那人群中流行一种动物纹和怪兽纹装饰的战斧^⑧（图一八，1、2），在西亚地区也同样存在着一些非作战使用的有銎战斧，这些战斧形制较为夸张，可能都是一种礼仪性用器（图一八，3-6）。



图一六 公元前 5 ~ 3 世纪阿尔泰地区墓葬中出土的明器短剑

1、3. 乌宗塔拉（Узунтала）I 号墓地 2 号库尔干 2. 乌宗塔拉 I 号墓地 3 号库尔干
4. 乌宗塔拉 VI 号墓地 5 号库尔干 5. 乌宗塔拉 VI 号墓地 6 号库尔干
（短剑为青铜、剑鞘为木质）



图一七 礼仪用有銎战斧举例

1.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 2、3. 大英博物馆收藏
4. 侯马上马墓地 M2008 : 33-1



图一八 中亚西部和西亚地区发现的仪式用斧

1. 巴克特里亚出土（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2. 伊朗东部出土 3-6. 伊朗卢雷斯坦出土
（分别采自 Luristan: Antike Bronzen Aus Dem Iran 一书图 67、图 62、图 63、图 27-29、图 11-13）^⑧

三、结 语

以上对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公元前1千纪有銎战斧的出土情境做出了初步分析，并对其中一些特殊的墓葬信息进行了解读。

在公元前1千纪的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男性墓葬中随葬武器的现象非常普遍，最常见的兵器组合是有銎战斧、短剑和弓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工，男性在社会和战争中占据着主角，女性主要处于从属的地位。虽然草原地区社会以男性为主导，但也存在骁勇善战的女武士。她们随葬成套的兵器，生前可能同男性一样参与战斗，这种女性墓葬发现数量相对较少。另外，还有个别儿童能够随葬成年人的武器，表明了在当时社会中财富和地位存在着传承现象。

从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随葬品组合和其他相关信息都可以明确有銎战斧的兵器属性。那些尺寸较小的鹤嘴斧也不是工具，而是同样安装长柄专门用来随葬的明器。部分有銎战斧还可能具有礼仪性的功能，这类礼仪性的有銎战斧一般与南部农业文明相关，相比之下，草原人群的有銎战斧更加简约，普及性更强。

由于草原地区生存条件相对困难，大部分男人都是出色的骑手，熟练地掌握兵器和骑术，他们不仅放牧和守护畜群，同时也是战士，因此，武士阶层构成了草原社会的主体，其他大部分老人、妇女和儿童都处于从属地位。草原文化的兵器组合简约而实用，武士机动而灵活，适合于远距离迁移和扩张。草原地区各地游牧文化中的传统因素不是十分明显，连续性不强，各区的发展动力往往是在某一先进地区向外传播的带动下向前发展的^⑨。这也使得以有銎战斧为代表的兵器组合可以较短时间内在广阔的地域传布，成为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最具特色的兵器系统。

注 释

张海：《田野考古学中几个常见英文词汇的内涵及其释义》，《考古学研究（十五）》，文物出版社，2022年。

②[英]伊恩·霍德、[美]斯科特·赫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③刘岩：《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context的含义分析》，《东南文化》2020年1期。

④曹玮、林嘉琳（Katheryn M.Linduff）、孙岩、刘远晴著：《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边疆地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700年的金属制品、墓葬习俗和文化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⑤郭立新：《墓葬情境分析与身份标识：以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⑥本文所指“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与《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一致，详见杨建华、邵会秋、潘玲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⑦本文所指的有銎战斧是指草原地区流行的横銎长柄类武器，既包括各类横銎斧钺，还包括有銎类的啄戈等。

⑧М. П. Грязнов. Аржан. Царский курган 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0.

⑨Konstantin V. Č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Anatoli Nagler,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raban Arzan 2 in Tuva,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

⑩Самашев З.С. Веселовская Е.В. Васильев С.В. "Золотой" воин из сакских курганов Тарбагата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No.4, 2019, С.126-139.

⑪А.Т. Толеубаев. Раннесакская Шиликт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Алматы: ИП «Садвакасов А.К.», 2018.

⑫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3年1期；b.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3期。

⑬Зайнолла Самашев. Берел, Алматы: Таймас, 2011; Самашев Зайнолла. Погребально-поминальная ритуалистика древн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берельских курганов), Мир Большого Алтая, Vol.3(4), 2017, С.510-547.

⑭于建军、胡望林：《2014年新疆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考古发掘新收获》，《西域研究》2015年1期。

⑮徐坚著：《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⑯Мартынов А. И., Бобров В. В. Серебряков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ып.3, Кемерово, 1971.

①⑦ А.Н. Липский. Погребения тагарских воинов на р. Бидже,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No.2, 1966, С.312–317.

①⑧④④ В.Д. Кубарев. Курганы Уландры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 1987.

①⑨ А.Д. Грач. Древ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в центре Аз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0.

②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⑪邵会秋著:《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②⑫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⑬ Яценко С.А. Женщины воительницы в искусстве ранних кочевников. Вестник РГГУ. Сери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е». № 1(11). Москва, 2018, С. 153 – 161.

②⑭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②⑮ Tsagaan Törbat, Pierre-Henri Giscard, Dunb ü ree Bats ü kh, First excavation of Pazyryk Kurgans in Mongolian Altai,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2017, Universität Bonn, Bonn.

②⑯ В.И. Козенкова. У Истоков Горского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2002.

②⑰吉县文物工作站:《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5年9期。

②⑱ В.В. Волков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⑲ William Watson.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⑩⑪ А.И. Мартынов. Ягуны, 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Кемерово: Кемер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3.

③⑫孟琦、彭博:《鹤嘴斧的功能及相关问题探讨》,《北方文物》2015年2期。

③⑬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В.А. Курганы Кызыл-Джар-I, VIII — памятник пазыры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Алтая. Вопрос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1983.

③⑭ А.А. Тишкин. История Алтая: Древнейшая Эпоха Древность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2019.

③⑮ П.К. Дашковский. Изучение курганов скифской эпохи

на могильнике Чинета II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Алтай),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ъезд, Барнаул: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No.2(94), 2017.

③⑯ Э.Б. Вадецкая, А.В. Субботин, С.В. Красниенко. Ашпыл—некрополь древн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евера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СПб: ИИМК РАН, 2018.

③⑰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В.А. Курганы Кызыл-Джар-I, VIII — памятник пазыры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Алтая. Вопрос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1983.

③⑱④④ В.Д. Кубарев. Курганы Сайлюгем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 1992.

③⑲ А. С. Савельева, П. В. Герман, Л.Ю. Боброва. Бронзы Кургана Алчедат I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таллургии Тесинского Этапа Таг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Марининской Лесостепи. Вестник Кемер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No.1, 2016 (65).

④⑩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俄罗斯米努辛斯克博物馆编著:《米努辛斯克博物馆青铜器集萃》,文物出版社,2021年,图版97-2、3。

④⑪ В.Д. Кубарев. Курганы Юстыд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 1991.

④⑫ Д.Г. Савинов. Кинжалы-«вкладыши» в пазыры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No.1, 2016(13).

④⑬李零著:《波斯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④⑭李学勤、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④⑮ Philip Denwood. Arts of the Eurasian Steppelands,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University of London, No.7, 1977.

④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6期,图十六,2。

④⑰ Victor Sarianidi. Margus. Ancient Oriental Kingdom in the Old Delta of the Murghab river, Ashgabat: Benatzky Druck&Medien, 2002.

④⑱ Gisela Zahlhaas. Luristan: Antike Bronzen Aus Dem Iran, Munchen, 2002.

④⑲杨建华:《略论中国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发展模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中国考古学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包桂红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Shaft-hole Battle Axes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 A Contextual Analysis from Steppe Warrior Tombs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Zhang Wenshan¹ Shao Huiqiu²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Oriental Human Origins and Civilization Exploration in Hebei Province 2. Th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Archaeological of the Silk Roads)

ABSTRACT: Building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xtual archaeological aspects related to the shaft-hole battle axes, including its excavation environment, burial characteristics, gender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assemblage of artifact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haft-hole battle axes an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ocial status and values of the warrior class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

KEYWORDS: Shaft-hole Battle Axes; Eurasian Steppe; Context